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
河东探“宝” 180

盐湖区三大寺

隐于闹市的禅悦与静谧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运城的寺庙文化如盐池碧波般深厚，提及“三大寺”，相信很多人会心生混淆：或念及永济普救寺的莺莺塔影，或思起新绛龙兴寺的碧落碑刻，或想起稷山大佛寺的第一土佛。盐湖区境内更是有报国寺、太平兴国寺盛名在外，只可惜如今仅剩一座孤塔孑立，难寻当年寺院盛景。

“三大寺”到底在哪，指代哪三座寺庙？殊不知，我们今日论及的“三大寺”，即为寺名，并非三足鼎立的建筑群，而是藏在盐湖区老城深处的一方古刹。

它坐落于南城墙街与东城墙路交叉口西100米的曹家二巷口，顶着“三大寺”的大气名号，偏偏低调得近乎隐匿。这里没有巍峨山门镇守一方，不见显赫铭牌昭示身份，唯有红墙灰瓦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出温润底色，与周边的民居院落、小吃店铺浑然相融。若不循着街巷细细寻觅，它便会湮没在寻常巷陌的晨昏里，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。

推开一道简易木门，便踏入一方清净天地。庭院不算大，相对十分紧凑，更像老式的旧民居，里面却佛韵四处流淌。弥勒佛、韦驮、伽蓝三尊铜像庄严肃立，化身护法菩萨镇守门口，鎏金的衣袂边角晕染着经年的禅意，默默护佑着这一方安宁。

问及寺名的由来，住寺居士含笑摆手解释：“哪有三座寺院的说法，只因殿内三佛并立，才得了这个大气的名号。”这里平时并非对所有访客敞开，故而采访当天，只好叨扰住寺居士代为引路。

循着居士的指引，推开正殿木门，迎面而来的三尊玉佛熠熠生辉，眉目间满是慈悲，俯瞰着往来香客。佛像前的香炉里



▲古寺红墙



▲文保碑记



▲飞檐木构

檀香袅袅，与殿外檐角风铃的叮当脆响交织缠绕，悠然禅意缓缓流淌，足以让人忘却尘世喧嚣。

正殿的创建年代已无从考证，现存主体结构为清代建筑。它坐南朝北，南北长约12米，东西宽8米多，占地面积约110平方米，面宽三间，为单檐硬山顶。从二楼可见其为筒瓦屋面，拥有一正脊四垂脊，两侧山墙设有排山沟滴，宝相花砖雕脊刹上设有“山”“寿”拒雀，前后檐均设飞椽。前檐柱头及补间的雕花花墩颇具匠心，明间辟门，额题“大雄宝殿”，两次间辟窗，只是如今门、窗均有改动。2012年，三大寺被盐湖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；2024年，寺院实施安防工程，布设了监控设施。

正殿外立着一座重修碑，便是这座古寺的“年轮”。据碑记所载，三大寺创建于清嘉庆年间，后续历经数次修缮，尤其是2004年（甲申年）的再次重修，更凝

聚了十方善士的心意，山门便是此次重修时所建，为砖混结构、上下二层木屋顶的现代建筑。

碑上字里行间记载着寺院的过往：从殿阁改建的忙碌到佛像贴金的精工，从迎请玉佛的盛事到募资修缮的细节，桩桩件件皆是岁月的印记。

碑文历史溯源提及，三大寺观音寺方圆十亩之大，清雅壮观，“历载沙门弘法盛延嘉庆二十二年”，脉络清晰。碑上还镌着薛字元、张大德等众善士改建寺中殿，上圣下智老和尚、上常下藏大和尚，以及多达百位的捐助者名录。一笔一画，皆是护持古寺的拳拳虔诚。“佛慧命述此寺肇兴之迹，而为告天下后世，古今大事尽在人为”“十方善士发心八方助资”，这些刻在碑上的文字，早已与砖石融为一体，成为古寺生命的一部分。那些捐钱捐物的名字，或许早已随岁月远去，但这份护持古寺的心意被刻进石头，流

传至今。

寺院二楼，安置的便是木雕贴金像。观音、文殊、普贤三尊菩萨皆身骑瑞兽，立于殿中，宝相庄严；地藏王菩萨像静立殿侧，慈悲满溢。或许，这便是“三大寺”之名的另一重渊源——三佛归一寺。

一方清修之地，于繁华闹市中辟出一隅禅意。人们踏足于此，于梵音袅袅间寻求心灵的澄澈，与自己的内心坦诚对话，摒弃俗世烦恼，终是渡人先渡己。

寺外是车水马龙的闹市，寺内是梵音缭绕的宁静。居士们洒扫庭院、焚香诵经，日子过得平和而有序。偶有附近居民进来歇歇脚，聊几句家常，没有繁文缛节，只有发自内心的自在安然。

这座以“三大寺”为名的小庙，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古迹，硬要评论，也只是运城老城的一枚印记。它藏着三尊佛的慈悲，藏着一方人的烟火，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最质朴的心安。

御笔镇河·石语千秋

——从“砥柱河津”碑看黄河文明的精神传承

门外的河湫庙内，后因庙宇与城池俱被黄河淹没，碑石沉埋地下。直至1988年，它才在河湫庙遗址中重见天日。石碑高298厘米，宽95厘米，“砥柱河津”四字为楷书，字径40厘米至50厘米不等，笔力雄浑，气势恢宏。

据《蒲州府志》记载，河湫庙始建于隋朝，原址位于黄河对岸的王城、大荔之间。唐玄宗为祭祀五岳四渎，将其东迁至蒲州城外的西南角。当时两庙并立，规模宏大，被誉为“大河西海之神”，其壮丽景象，远非寻常祠庙可比。依照《会典》，官府每年春秋举行常规祭祀活动，若遇重要庆典或水旱灾害，朝廷更会遣使者携诏祭祀，仪式极为隆重。

明代正统年间（1436年~1449年），河湫神庙由知州、关西人张廉侯奉诏修建。然而，历经百年风雨，庙宇逐渐破败凋敝。正殿、寝殿、仪门、前坊及井亭、碑亭的琉璃瓦和彩绘金碧大多已剥落，只有屋椽、梁柱、柱础没有歪斜毁坏。负责祭祀的官员只是沿袭旧例，对于管理和扫除却无专人负责。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一场大地震使庙宇一夜之间倒塌，

沦为废墟。到了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夏天，黄河洪水暴发，淹没城外郭，洪水奔涌冲击西北两个城门。当时，淮安、徐州一带连年黄河决口，漕运水道艰难阻塞。议论朝政的人都认为，河湫神庙应当及时修缮，以祈求神灵赐福。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十月修缮工程重启，历时两年，终使庙宇重现辉煌。

修复后的河湫庙与海神庙并立，规模相当。正殿七间，寝殿五间，辅以风、雨、雷、电四祠，仪门、井亭、碑亭、牌坊一应俱全，环廊二百八十六间，围墙周长三百二十二丈。殿宇庄严，金碧辉煌，成为一方百姓的精神寄托。

到了清代，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，圣祖皇帝巡幸蒲州，驻跸蒲津，亲见黄河奔腾之势，如烈马脱缰、蛟龙翻腾，连年水患使百姓苦不堪言。康熙触景生情，挥毫题写“砥柱河津”四字，取“砥柱中流障怒涛”之意，以喻坚毅不屈之志。御笔被勒石永存，成为珍贵的历史遗存。

历代帝王对河湫庙的加封与祭祀，实为一种政治仪式，通过尊崇河神，宣示皇权正统，祈求国泰民安。然而，隆重的

典礼终究难敌自然之力。今日，河湫庙已湮没于黄河滩涂，唯余石碑独立荒原，默默诉说着往昔的辉煌。

站在石碑前远眺，黄河如一条浅浅的白线静静流淌。古今对比之下，治河理念已发生深刻变化——古人建庙祈神，今人科学治理；古人敬畏洪涛，今人调控水文。变的是手段，不变的是“天下黄河久治长安”的初心。

石碑不语，精神永续。如今，“砥柱河津”碑已成为黄河文化的重要象征。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与黄河相生相克的千年历程，记录着从被动祈愿到主动治理的文明进步。

黄河依旧东流，但人类与黄河的关系已进入新阶段。从祭祀祈福到科学治理，从敬畏自然到和谐共生，这块石碑默默见证着中华民族治水智慧的升华。它提醒我们：黄河养育了中华文明，而人类也用智慧与坚韧回报着这条母亲河。

这块石碑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，更是精神的象征——那种在激流中屹立不倒的“砥柱精神”，至今依然激励着人们在与自然共处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。



□尉会萍

冬日的暖阳洒在黄河岸边，堤坝一侧矗立着一通石刻——“砥柱河津”。这虽是一通复制碑，原碑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，静卧于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内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追溯它的故事。

“砥柱河津”石刻原立于蒲州故城南